



龍應台：從作家到文化決策者的身份轉換

我的香港，我的台灣

九個月前，她離開香港，去擔任台灣文化部最高的決策者。
九個月後，她回到香港，以公務員的身份考察這裡的文化環境，短短七日，片刻停留，身份轉換，心境依然。
從前的九年，她是身在香港的作家，而如今的這九個月，她是身在台灣的「文化部長」，改變的是頭銜、是外在的稱謂，不變的是對華人世界依然有夢。
所有的努力都不必去刻意彰顯，今時今日的龍應台，暫時放下手中的筆，是為了思索更多，將文化的力量落實得更細微。而唯一不變的，是她依舊心繫香港、心繫台灣。
香港依舊是她的香港，而台灣更從來都是她的台灣。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：劉國權

七日裡，走過的行程，其實都是此前九年中，她穿街走巷無數遍的那些路。只不過身為作家時，背上相機穿上球鞋，誰都不認識自己，而以公務員的身份，帶著同仁、帶著特定的問題意識來考察，印象與感觸截然不同。
龍應台這些天走了不少地方：伏炭藝術家工作室、地下樂團live house等。幾乎每一處行程，隨行的台灣藝術家都和她有相似的感覺——香港草根藝術的表達能量，在這二十年來大幅成長，她們也會從時間表來比較，其實台灣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已發展到這樣的程度。
唯獨走到最後一站，龍應台和隨行的台灣人都歎為觀止，自認「這方面台灣距離得很遠，還需要很多的投入才趕得上。」
她們的最後一站是亞洲文獻藝術庫 (AAA) 和香港藝術博覽會 (HK Art Fair)。無論是前者的非牟利NGO運作，還是後者講生意、斤斤計較、國際型的賺錢運作，兩者的國際化程度、專業運轉和高度精準程度，都是台灣目前無法比肩的。
華人世界，兩岸四地，不同的歷史脈絡，導致不同步的發展進程。沒有誰更先進、誰更「偉大」。龍應台認為，相對於大傳統、大敘述的「偉大」，台灣和香港都是邊陲，但她相信邊陲有邊陲的自由和優勢，正因為是邊陲，所以才有溫柔如水的力量，而這，恰恰是大傳統和大敘述所提供的一種另類幫助。

台港文化交流的意義

過去的九年香港經驗，龍應台稱之為「受教育的過程」，她對華人世界的想像實際上也是在這裡被開發出來的，心目中對正統與邊陲的定義，因香港而徹底改變。

她眼中的香港，正在經歷「開花」的階段。就以西九為例，2004年她初來香港時，無法理解，這麼重要的文化建設項目，整個社會怎麼竟然一片寂靜，於是她在文章裡表達自己的震驚：「西九是誰的西九？」其後兩年，大批文化界人士站出來關心、討論西九的發展，再後來政府開始傾聽民意，結構規劃作出重大調整。目睹這樣的過程，本身就是在目睹港人自我認同和文化意識的開展。

這次她前來香港，參觀西九文化區地盤，了解西九場館分期落成的時間表，其中預計最早落成的地標建築「戲曲中心」，剛好與台灣正在建設的文化工程中的戲曲場館，在開幕時間點上相當吻合。因而討論香港的粵劇劇團與台灣國光劇團是否可能合作、香港的粵劇文化是否可深入台灣進行在地交流，也是今次龍應台考察西九的主旨。

她相信，香港和台灣，民間和官方，都該有更多深刻的交流。
從2月15日上任，整整九個月，她始終在思索：「相較於香港，台灣的力量在哪裡表現出來？」台灣不具有香港「逃生門」的特質，在龍應台的形容中，「它反而是一個讓人想留下來，找一片有土的地方去種絲瓜的地方。」

香港政府官員告訴她，台灣已變成香港人想去度幾天假的第一選擇，那麼台灣最可愛的地方在哪裡？

龍應台說：「台灣的可愛就在於它不假裝，不用力變成甚麼樣子，大的調性上是一種文化的從容。」而她更希望以後香港人再去台灣時，手裡不只拿着一份地圖找士林夜市、找武昌街的美食，「我想以後香港的朋友到台灣，說不定可以手上有個地圖，知道台北哪條街有獨立書店，然後再到台中的獨立書店，再去淡水河邊，那裡有個只賣詩集的獨立書店——就像荷花池裡只有荷花，沒有一根雜草。」她相信，倘若港人可以這樣拿着地圖從南到北、從西到東走台灣，將會是一種不同的文化碰撞。

文化的細水長流

龍應台心目中的文化部不是為政府做宣傳，而是幫助台灣的文學家、藝術家等文化界別人士和全世界做朋友。而身為「文化部長」，她要考慮的是怎樣可以為台灣文藝搭更多的橋樑，怎樣將資源的再分配做得更好、定位得更清楚。

「文化部不是一個人就能完成的東西，我有500位同仁在文化部本部，還有很多在博物館、交響樂團，它總共是兩千人的集體工作。」

這九個月來，她思索了些甚麼？
她用相機拍下台灣屏東街頭騎摩托車的一家四口，那張照片裡，最小的女孩躲在帽子後面已經睡着了。她常常和次長、司長討論的是：「我們是資源的再分配者，納稅人的錢放在我們政府手上，然後我們去考慮資源要如何用，是全都用到大都市鋪着紅色地毯、掛水晶燈的那些地方嗎？那像屏東鄉下這樣一家四口，媽媽帶着三個小孩，請問她們得到的文化資源到底有多少？」

她在思索的是：「那些資源怎樣做，才能讓那個躲在帽子後面睡覺的孩子也受到文化的滋養？我們要服務的文化精英和我們的草根大眾間的關係是甚麼？」
於是，當龍應台在和同仁開規劃會議時，她要求每一個文化官員質問自己：「我受全民之託拿着納稅人錢的時候，我對不對得起自己的良心？我有沒有慎思明辨？我有沒有追蹤評鑑？我對不對得起住在部落深山裡的原住民小孩？」

這就是台灣首任「文化部長」的核心思想。

與此同時，龍應台也必須思索在一個已經運行得相當成熟的民主制度中，她這個文化部最高決策者，跟代表民意的立法委員間的關係是甚麼？當她有壓力時，到底甚麼是應該妥協的？這樣的問題是在每一個公文批示上、每一個要做的回應中，都必須進行的思路決定。她坦言：「我有時候必須要用某個比例的妥協，來換取更重大的事情，那這種判斷中，重大的事情跟不得不做的比較小的妥協，這中間比例的挑戰，每天都在進行。」一天24小時、一周七天，排山倒海的抉擇都在挑戰着她。而她更需要不斷思索：「在每四年換一個執政者、換一個『文化部長』的這種體制裡面，究竟怎樣能做到文化的細水長流，如何去細水長流？」

台灣很小、很泥土，可因為各種歷史因素，龍應台認為，台灣在華人的文化傳統中反而變得比較可以用實踐去落實。「當有一個願景卻要做出來時，你會跌倒、膝蓋會流血、會做錯、會羞愧。」但台灣人更在意的是：「我的膝蓋要怎樣修補，我在最挫敗時，怎樣能有尊嚴地再向前走？」這也是龍應台對文化部的願景和期許。

她認為整個華文世界對台灣的觀察，並不是台灣做得多好，而要看台灣在甚麼地方有所開拓，在甚麼地方摔了跤、摔倒之後又怎麼站起來。

龍應台說：「你們可以把我當做一個民主實踐的標本。」無論台灣有多少缺陷，但在「文化部」這樣一個首次新增的政府部門之中，重視公民文化權的她，必定會以她的方式，去為她的台灣，書寫最動人的文化新篇章。



《我的香港，我的台灣》 講座內容節選

編按：這場日前在港大舉行的講座，是龍應台就任台灣「文化部長」後首次在港舉行的公開演講。



在香港生活過的所有人，沒有人認為自己是它的主人，所有人都是移民，只是來的時段不同，因為有這麼多移民聚集，所以香港很容易讓無論是生活過一年的人，還是九年的，都會覺得「這是我的香港」，所以它有一種開闊的包容力量讓很多外人留下來。當我說「我的香港」時，覺得還蠻舒適的，不會有人覺得「這個香港不是你的」，至於「我的台灣」，當然，從頭到尾我是一個在台灣南部農村和漁村長大的小孩，尤其當你是從距離泥土很近的環境下長大，對這個社會便更有強烈的認同感，所以「我的台灣」是理所當然的。

香港是「逃生門」

香港的九年歲月對我很重要，因為它推翻了以前對中國華人社會和歷史的認知，我這一代人在台灣成長，對整個中國文化的認識是從大傳統、大敘述、統一的說法出發，這種大敘述作為核心思維，永遠從北邊來解釋整個區域的結構，是直到我到香港後才被推翻和打破。這是一個多麼巨大的教育過程，到這裡我認識到，香港得利於兩件事情。第一件，它得利於它的缺點，它是所謂的「邊陲」，最重要的主題外邊的一小塊多出來的地方。因為是邊陲，所以那個規範的大力量，顧及於它的鞭長莫及，所以它有個自由的空間。同

時，香港又得利於整個十五六世紀以來，西方不小心把現代化帶進了這個比較空的體系之中（因為是邊陲），所以它一直是中國的一個「逃生門」。

太平天國血流千里，十幾年時間生靈塗炭，能夠逃的人逃到哪裡去？大海吧，或者香港那個小口袋，它的逃生門就打開了，一大堆人湧進香港。戊戌政變的時候，被追捕的人經過逃生門進來。辛亥革命的時候，人往哪裡去？逃生門又打開了。1949年內戰的時候，170萬人湧進來。文革那個你在河裡都撈得到屍體的年代，逃生門又在這裡。一批批的人湧進來時固然帶來很多問題，可是也留下東西，他們帶來資金、歷史經驗和人才，從而灌溉了這個「邊陲」的土地。

辛亥革命後，那些清代翰林到哪裡去了？因為他們有不食周粟的決定，他們不認同「中華民國」的概念，於是經過「逃生門」來到香港。香港大學中文系1927年成立，是受這些清朝翰林和史家所灌溉的。他們還成立了很多書院、學院，教了很多學生。留下了很多書籍善本，這些善本在哪裡？中文大學有，中央圖書館有，香港大學也有，一波又一波不能認同前朝的人，它會從逃生門來到這裡，然後很多智慧的結晶就留在這個「口袋」裡了。

問：很多人認為香港是「文化沙漠」，您對此有何看法？

答：如果你覺得香港是「文化沙漠」，本身已透露出你對文化進行了怎樣的定義。如果你比較窄地把文化定義為用文字傳達思想、限定為所謂「人文」的部分，那麼香港是的，因為它前面150年歷史是那樣走過來的，但如果對文化的定義是一個寬廣定義，那香港文化非常多元豐沛。

我常說我覺得香港是一個「故事島」，它有100個藏着故事的抽屜，但有90個還沒有被打開過。我們不能夠因為90個抽屜裡的故事還沒被好好地說出來，就覺得它是個「文化沙漠」。但如果你去薄扶林村走一趟、去大澳走一趟，甚至禮拜天早上十點之後去任何飲茶的地方、去看一看傳統的婚禮，就會知道香港的民俗文化非常生猛。如果再深入它的粵語文化、粵曲文化，更會知道，粵語的鮮活存在，在這裡保存得比廣州還要好。而如果我们說流行文化 (pop culture)，談到香港的流行文化，誰會說它是沙漠呀？我們沒有人這麼說。如果再開闊一點說，文化裡同時包含法治的生活方式，那麼香港比很多地方好很多。所以我覺得香港人要有自信，下回別人再提到這個問題時，要反駁說：「請問你對文化的定義是甚麼？」